

哲
学
研
究
论
丛

哈贝马斯视域 中的公共性研究

黄皖毅◎著

红旗出版社

哈贝马斯视域 中的公共性研究

黄皖毅◎著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哈贝马斯视域中的公共性研究 / 黄皖毅著 . —北京 :

红旗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7-5051-4306-7

I. ①哈… II. ①黄… III. ①哈贝马斯 (Habermas, Jurgen 1929-)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 B51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5460 号

书 名 哈贝马斯视域中的公共性研究

著 者 黄皖毅

责任编辑 刘险涛 周艳玲

装帧设计 人文在线

出版发行 红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沙滩北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727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发 行 部 010-57270296

印 刷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70mm × 240mm 印 张 1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1-4306-7 定 价 45.00 元

欢迎品牌畅销图书项目合作联系电话: 010-57274627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前哈贝马斯的公共性思想	21
第一节 先哲视域中的公共性	21
第二节 阿伦特的公共性思想	34
第二章 哈贝马斯的公共性思想：以“公共领域”为中心	43
第一节 公共性与公共领域	43
第二节 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	48
第三节 公共领域及其功能	50
第四节 公共领域的历史演变	55
第五节 公共性危机	60
第三章 哈贝马斯的公共性思想：以“生活世界”为中心	66
第一节 生活世界的“临时介入”	66
第二节 生活世界的理论源头	70
第三节 交往行动与生活世界	79

第四节	生活世界与体系	90
第五节	生活世界与公共领域	95
第四章	哈贝马斯公共性思想反思：理论视角	105
第一节	公共性：理想性与现实性	105
第二节	公共性：普遍性与多元性	111
第三节	公共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118
第四节	公共性：批判性与建构性	122
第五节	公共性：社会性与哲学性	125
第五章	哈贝马斯公共性思想反思：现实视角	135
第一节	公共性的科技维度	135
第二节	大数据时代的公共性	145
第三节	微时代的公共性	154
余 论	161
参考文献	176
附 录	公共性与国家治理能力刍议	185
后 记	193

导 论

一、研究的缘起

(一) 公共生活与公共哲学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怀着一颗好奇之心对世界的不断追问。孔子在河岸上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赫拉克利特也给世人留下箴言：濯足急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中说，存在物就像是奔腾不息的河流，事物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中外哲人不约而同地道出了“变化”给我们带来的生命感受，当然，也包括对我们的思考所带来的冲击。哲学就是对我们的生活的反思，对世界的变迁的反思。万事万物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如今当审视这个幻化万端的世界，便会发现我们不知不觉地身处于一个多彩多姿的公共生活之中。

人从自身历史的起点开始就是复数的样态，是一种群居者，因而是类的存在物，这就意味着人类最初的生活就带有公共生活的色彩，即使是出于对洪水猛兽、洪荒之地的恐惧而被动地卷入公共生活，也不能否认这一点。公共生活并非是抽象的，它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是活生生的、非常现实的，是人的一个基本的生活事实。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渺小，出于生存的需要，人与人之间要依偎在一起，形成一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共同生活。整个原始氏族或部落能存活下去，就是这一群体最大的公共利益，以

这个公共利益为中心点所进行的活动，都属于公共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生活无疑强化了人的本质的社会属性。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公共生活日益呈现出复杂性，围绕着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人们通过聚会、社团、组织、大众媒介等方式，进行着具有丰富多样性的交往活动，这都是公共生活在历史长河中的新延伸。由于人又是个体的存在者，每个个体进入公共生活的方式、程度和限度等又千差万别，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传统、不同时代的人们也拥有不同样态的公共生活。因而，尽管公共生活像是一条多姿多彩的河流，其中也不免有泥沙、漩涡或者暗礁，也就是说，公共生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给公共生活造成了破坏，制造了发展的阻力，这些问题需要人们去发现、思考和解决。

既然如此，从学理层面上去把握公共生活，去厘清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关系就很有必要，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因此很多具体学科中都有关于公共性、公共生活的探讨。哲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在其萌芽阶段，又被称为“形而上学”，意为研究有形物体、物理世界背后的意义世界，是具体器物层面之上的更深入、更抽象的求索，所以哲学有可能被误认为是远离现实生活的、高高在上的纯粹思辨。诚然，在闲暇的时间里，沉静的、纯粹的思辨能给人带来不可言喻的愉悦和奇特的快乐。但是，这只是哲学的一种面相。向生活世界、现实世界敞开的哲学，应该作为它的另一种面相，和时代、生活相互应和的哲学也能带来愉悦和快乐。

马克思曾说：“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①“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②也就是说，每一种哲学思考，每一个哲学问题的提出，除了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

粹思辨的、高度抽象的部分，其他都和自身所处的时代气息相通的，都是生活世界的大树结出的珍贵果实。公共哲学应运而生，即是对时代精神的反映和对现实生活问题的回应。对公共生活合理性和公共生活智慧的追求，映照在生活世界发展与演进的轨迹。将公共性作为哲学的研究主题凸现出来，是从一个角度对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诸方面进程的一种参悟。

20世纪以来，人类生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当代公共哲学首先发端于西方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美国，不得不归因于美国公共生活的状态和变化，也可以说这种重兴的哲学是植根于美国公共生活的沃土之中的。

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社会公众对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对公共支出尤其是联邦政府公共支出的需求增加，对政府的公共投入、公共政策、公共服务等异常关注，联邦政府也由此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同时，在这个历史时期，美国对世界各国移民的接纳也较以往时期更为宽松，作为一个多族裔、多国别、价值观多元的新移民国家，文化碰撞、种族冲突往往是不可避免的，有时甚至发展成常态，尤其是黑人、白人之间冲突不断；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公共生活被各种矛盾冲突条块分割，整合、指导公共生活的公共精神就变得弥足珍贵。

而美国人又有其自身的一些特性，他们表面上看是非常崇尚个体的、是非常私人的，但是却并不缺少对公共生活的关注和对公共精神的追求。美国宪法学者阿克曼曾经提出过一个有意思的概念——“私人公民”（private citizen），来界定参与着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人。在他的解释维度里，有两种现象都属于极端：一个是利己主义者，也就是他所说的私民，基本上是不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另一个是公共公民，始终主动而积极地参与公共生活。无论是哪一种，都过犹不及，因此，这两类人在社会生活中属于少数。阿克曼认为大多数美国人属于私人公民，是既过私人生活，也过公共生活的，兼具私民和公共公民两种角色的。他们的状态常常是，平时都是非常专注于私人生活的，但某一事件激发，他们又非常积极投入到公共生活之中。尤其是当社会中出现波及面广的某种事件，对人们的私人生活造成极大的破坏，则更能激发人们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关注和反思。

而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确实出现了这样的现象级事件，即基于冷战

思维的麦卡锡主义。麦卡锡主义肇因于美国参议员麦卡锡，主要是出于反共的目的，而后蔓延成恶意诽谤、肆意迫害民主进步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甚至排外的一场政治运动。它是在美苏争霸时代、利用民众对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红色恐惧”，利用列黑名单、监控、迫害等非常规手段，掀起了一场“反共”“反民主”的政治狂潮，时间是1950年至1954年间，有学者也称之为“美国文革”。麦卡锡主义作为一个专有名词，作为美国的极端右倾主义，成了政治迫害的同义语，虽然整个过程只维持了四年，但是它的影响从共时性维度讲，可以说涉及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从历时性维度讲，可以说影响到当代美国人的社会生活，在当代美国人的潜意识深处还有所遗留，使得在美国民众中“共产党”“共产主义”等依然还是一些敏感词汇。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被贴上“社会主义者”标签的候选人桑德斯曾感慨地说，许多美国民众一听到“社会主义”这个词，就非常紧张，从冷战以来，这个词变成了贬义词，成为攻击对手的一种工具。

毋庸置疑，麦卡锡主义给美国公共生活造成的巨大分裂是非常明显的，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现实，使得人们必须面对公共生活的质量、公共生活伦理规则、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等，这就促使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思考公共哲学问题，其中包括一位美国知名人士沃尔特·李普曼。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是美国新闻评论家和作家。他出身于美国纽约的一个犹太人家庭，是德国犹太人的后裔。大学时入读哈佛大学，曾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参与成立了哈佛大学社会主义学社，而后退出。1914年，他帮助友人创立了一份持自由派观点的杂志——《新共和政体》。1917年，李普曼被任命为当时的战争部长助理。1918年中期他以美国陆军情报部上尉的身份赴法国。1921年加入纽约《世界报》。从李普曼的人生履历来说，他的职业生涯主要和新闻媒体有关，在多家媒体供职，两度获得美国新闻最高奖，一次是1958年凭借出版了关于外交、政治和经济的著作获普利策新闻奖，另一次是1962年凭借出色的国际报道再次获奖。俗话说，三十而立，李普曼在三十岁之前就已经成名，以至于当时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见到他时，调侃他是“全美三十岁以下最著名的男士”。

李普曼一生中做了4000多期专栏，出版了约20本书，主要有《政治序论》（1913年）、《舆论学》（1922年）、《道德序言》（1929年）、《良好的社会》（1937年）、《冷战》（1947年）、《公共哲学论文集》（1955年）、《共产主义世界与我们的世界》（1959年）、《李普曼精选集》（1963年）和《早期著作》（1970年）等。其中关于公共哲学著作的发表，使得他又挂上了一个头衔：哲学家。其实结合李普曼大学阶段的求学经历，这也不算是非常突兀，因为他本身有一定哲学研究的天赋。根据《李普曼传》所记载，李普曼在大学二年级时写的一篇文章，得到了哈佛大学哲学系著名教授、美国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威廉·詹姆斯的高度肯定和赞赏。这位须发皆白、名重一时的老教授为了表示自己激赏，主动到李普曼所住的学生公寓里去看他。李普曼也受到过哲学方面的熏陶培养，他在哈佛攻读研究生时，曾任桑塔亚纳教授的助手，协助讲授哲学史。桑塔耶亚教授来自西班牙，是著名的自然主义哲学家、美学家，他早年到哈佛大学求学，而后留校任教，是美国美学的开创者。李普曼本身擅长文字表达和独立思考，又获得哲学教授们的指点，他能在哲学的领地里有所开拓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当然李普曼的哲学思考还是和他最擅长的新闻传播密切相关，在探讨公共哲学之前，他早在1922年写就了一本后来被当作新闻传播领域教科书的作品——《公众舆论》（又称《舆论学》），这也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经典之作。他基于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对公众舆论进行了研究，指出现代社会庞大的规模和复杂的结构，使得人们难以获得整体性认知，因此主要凭借印象、成见或常识来形成意见，更不用说大众受到由媒体造成的拟态环境的操纵，使得他们就像柏拉图所批判的洞穴中的囚徒一样，把洞穴当成了真实的世界，或形成对世界的刻板印象。根据他的分析，“公众舆论”是脆弱、摇摆和不可信任的。在这方面，作为民主的重要参与者的公众只不过是有名无实的。

有了这样的研究基础，在麦卡锡主义的冲击刚刚结束之时，1955年，李普曼写作并出版了一部著作《公共哲学》（*The Public Philosophy*，论文集），拉开了当代公共哲学研究的序幕。书中认为公共哲学自古就存在了，古代公共哲学的作用是维系城邦国家的存在和发展，近代诸多伟大的启蒙者和思

想家也在自己的论著中提出过非常精辟的公共哲学思想，而在现代尤其是现代美国，公共哲学的根基——公共生活却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腐蚀了，公众不再具有公共精神，所以他呼吁，西方社会有必要复兴公共哲学，以之来引领社会生活。正由于在现代西方世界第一个提出了“复兴公共哲学”的观点，李普曼也被冠以哲学家的头衔，被誉为当代公共哲学“旗手”。虽然他的观点 20 世纪 50 年代在美国未能引领学术风潮，但是当时间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桑德尔、诺齐克、罗尔斯等人接过了他手中的旗帜，对公共哲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公共理性、公共伦理等进行了研究，同时也影响到了欧洲学界。

日本学界是研究公共哲学的另一支力量，而且颇具特色。20 世纪 90 年代初，公共哲学的研究热在日本兴起，呈现出一种堪称前沿性哲学探索的学术运动。最初在欧美公共哲学研究的影响下，日本有学者翻译了李普曼的《公共哲学》（论文集），引起了多方的兴趣。随后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等高等学府，先后设立了与公共问题研究相关的学科，涌现了一些代表人物。但日本的公共哲学研究成为颇具规模的学术运动则得益于 1997 年成立的研究平台——“公共哲学共同研究会”。该研究会由“将来世代综合研究所”金泰昌所长和东京大学法学部部长佐佐木毅两位学者共同倡导发起，得到了将来世代国际财团矢崎胜彦理事长提供的资金支持，才得以在在京都成立。1998 年 4 月该研究会召开了面向全国的第一次研讨会，拉开了在日本的这场学术运动的序幕。从此以后，日本国内各个领域、各个学科的学者都积极参加研讨会，进行对话交流，有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宗教学家、西方哲学专家、日本思想专家等，他们在日本乃至世界的学术界都是有影响的，同时也积极邀请欧美、中国、韩国等世界各国的学者参会。10 多年来，他们围绕着公、私、公共性等公共哲学探索中最基本的几个核心概念展开了广泛的对话、讨论，这种学术景观在日本学术界是前所未有的，其会议论文被整理、编辑成书，由东京大学出版会以《公共哲学》为丛书名出版，第一个系列预计为 20 卷，2006 年已经出版完毕，在日本学术界引起了极大反响。期间，日本公共哲学的代表人物也不断推出新作，赢得了肯定，比如山胁直司教授就是其中的典型，他出版或发表了《全球化的公共哲学：通向“活私开公”之路》（2008 年）、《不稳定的全球化时期的全球公

共哲学理念》(《国际公共事务杂志》，2006年)、《何为公共哲学》(2004年)等，在公共哲学领域里不断开拓。日本学界不仅借助于学术平台对公共哲学进行了探索，而且还将公共哲学发展成为一种实践运动，他们对公务员系统提出了要求，即在公职人员进行公共哲学为内容的培训，或者将公共哲学作为入职考核的组成部分，可见，公共哲学在实践领域也大有作为。

我国的公共性问题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萌芽。这主要是得益于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比如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的互动和交流，使得中国学术界也逐渐熟悉了公共哲学这个学术新概念。当然公共哲学在中国引起关注主要还是现实的激发。中国社会之公共性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刻而特殊的背景，它和中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公众公共意识的觉醒、政府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层面的改革和转型有着密切的关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入深化阶段，社会全面转型，经济改革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使中国的公共生活具有了双重性：一方面，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生活的社会公共化程度日趋增高。公众仿佛突然感受到自身的私人性与公共性的并存，人们一边道着家长里短，一边纵论国家大事、世界形势，他们借助各种各样的渠道尤其是新兴的媒体表达自身对公共事件的关注，一种自下而上的公共领域正逐渐形成。当公众的目光越来越多地聚集于社会公共生活而非私人领地时，就意味着他们以公民的身份对社会提出了秩序、安宁、和谐等方面的越来越高层次的公共生活的追求。另一方面，社会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公共性危机凸显。公共性一旦丧失，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培育出来的。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持续、快速、稳定的发展，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这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两者互相重叠交织、复杂多变，呈现出光怪陆离的图景。公共权力的滥用、网络公共领域的无序、公共道德的严重退步、弱势群体的公共性诉求被忽视等等，这些就是公共性的危机或者说公共性的丧失，很多事情的发生都远远出乎人们的意料，也大大超出了传统理论资源的解释框架，新的解释范式亟待出现。

在这种背景下，学者们对“公共性”问题开展研究，公共管理学科较多地使用公共权力、公共决策、公共物品等概念，建筑学科则提出公共空间、公共审美、公共建筑、公共场所、公共艺术等概念，伦理学科对公共规则、

公共伦理等情有独钟，各个学科不胜枚举的概念术语，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关注了“公共性”问题，交织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研究空间，充分体现了对我国公共生活合理性的追求，也取得了一定得研究成果。聚焦于公共哲学方面，从1995年开始，由王焱主编的《公共论丛》陆续出版。但是较有影响力的研究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才出现的。2003年，江涛出版了《公共哲学》一书，这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新兴哲学丛书”中的一本。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林美茂教授等人组织翻译的前文提到的日本10卷本“公共哲学”也得以问世。其他成果主要体现在论文上，如万俊人、何怀宏、任平等人都曾应邀在期刊杂志上进行“公共哲学”方面的笔谈。应该说，我国学界的研究还很初步，主要的工作是介绍、解读西方公共哲学、日本公共哲学的观点，尤其是当代赫赫有名的哈贝马斯、罗尔斯、桑德尔等人的观点，对公共哲学核心概念的界定、理论空间的构建、方法论原则等的确立等也展开了讨论，但实事求是地说，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自己的分支学科——公共哲学，更不用说形成与日本类似的学术活动和现实运动。

（二）哈贝马斯及其思想魅力

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哲学，学者们的公共性研究受到欧美和日本的公共哲学的很大影响。以“公共领域”为学术标签之一，于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当之无愧是欧美公共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公共领域问题研究的滥觞直接源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德语 *Offentlichkeit*，英语 *public sphere*）一词是其名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核心概念，也是欧洲主流学术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学者、哈贝马斯的研究专家麦卡锡认为，在我们的时代，就思想的深度和广度来说，没有人能和哈贝马斯比肩。当人们提到哈贝马斯，往往称他是当代德国最负盛名的、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哈贝马斯1929年6月18日生于德国，其故乡是美丽的杜塞尔多夫，然而他的童年生活实际上被纳粹的阴影所笼罩。他好学深思，曾在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波恩大学等世界知名高等学府求学，并于1954年在波恩大学获哲学博

士学位。由于法兰克福学派核心人物特奥多尔·阿多尔诺（Theodor Adorno, 1903—1969）的赏识，哈贝马斯于1955年到了法兰克福大学，一开始他的思想是比较激进的，但他在学术上不断淬炼，逐渐成长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1961年，他写了日后蜚声世界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这篇论文是他用来申请教授职称的代表作品，得到了马堡大学的一名教授的认可，顺利通过评审，1962年该书得以出版面世。1962—1964年，哈贝马斯受聘海德堡大学，担任哲学副教授，1964—1971年回到法兰克福大学，担任哲学与社会学教授，1971—1981年到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就任所长，1983年重返法兰克福大学，199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他到中国讲学，哈贝马斯欣然应允，在多所高校进行了演讲，广受欢迎，载誉而归。如今哈贝马斯虽然年事已高，但仍活跃在一些前沿的学术活动之中。

哈贝马斯是当代罕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学术观点深受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韦伯等大师的深刻影响，甚至被称为“当代的黑格尔”，他承袭了德国深厚的哲学及社会学传统，在众多的学术领域都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以至于很难对他的学术旨趣进行一个概括。总体而言，他是“哲学和社会学的介入型思想家”，代表了一种现代的和富有生命力的哲学风格，这种哲学风格最显著的特点是：兼收并蓄、博采广收、为己所用、多学科交融、构建宏大哲学体系。这主要表现在他活跃的学术活动和丰硕的学术成果上。

哈贝马斯的标志性理论为交往行动理论，与他的哲学旨趣相应，他在哲学实践中大多采取了独特的对话的方式，与西方当代哲学的潮流保持同步；他与经典思想家胡塞尔、马克思、韦伯、卢卡奇等人进行“视界融合”式的对话，广泛地涉及当代社会的各个方面；他与当代语言哲学家奥斯汀、塞尔勒交流式的对话，使其思想与西方当代哲学的潮流保持同步或与之融合为一；他与伽达默尔关于解释学方面的论战，与帕森斯的亲炙弟子卢曼关于结构功能论的争论，与利奥塔德等人卷入牵涉层面极广的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的交锋……这些“视界融合”对话、交流式的对话、论战式的对话的结果是产生了其六十年代著述系列：《理论与实践》（1963）、《认识与兴趣》（1968）等；七十年代著述系列：《劳动、认识、进步》（1970）、《社

会理论还是社会工艺学?》(1971)、《社会科学的逻辑》(1970)、《文化与批判》(1973)、《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1973)、《重建历史唯物主义》(1976)、《交往与社会进化》(1976)等;以及八十年代著述系列:《交往行动理论》(二卷集,1981,1984)、《道德意识与交往行为》(1983)、《现代性的哲学讨论》(1985)、《后形而上学思维》(1988)等,是一位极其多产、著作等身的思想家。哈贝马斯学术研究的独特风格,其对建构宏大体系的执着,其理论的深广,其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哲学、科学哲学、解释学、现象学等视域的广泛介入,构成多重视域相互辉映、相互交叉的态势。

哈贝马斯的学术生涯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60年代初到60年代末,认识论建设阶段。此阶段哈贝马斯的研究中心是在认识论、社会学和社会哲学方面。第二阶段,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普遍语用学阶段。此阶段哈贝马斯的思想发生了重要转折,即“语言学转向”,其理论旨趣转向对话语用的研究,其中也就包括从语言符号的角度对交往行为的研究。第三阶段,80年代以后,交往行为理论阶段。此阶段哈贝马斯进一步发展扩大他的社会哲学理论体系,社会稳定问题为这一阶段的重要论题之一。总之,哈贝马斯的学术视域十分宽广,包含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诊断、社会批判理论、意识形态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等各个方面。^①

哈贝马斯虽然思想体系庞大繁杂,但是其中却有一个主题他终生都在关注。据他自己的说法:“在1999年我七十岁生日的时候,我的学生们编辑出版了一本纪念文集,题为《理性的公共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理性》。这个标题选得很不错,因为公共领域作为相互之间理性交往的空间,是我一生都在关注的主题。”^②明确地宣称自己对公共领域的重视,应该说没有人比哈贝马斯更了

^① 参见〔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版,译序。

^② 〔德〕哈贝马斯:《公共空间与政治公共领域——我的两个思想主题的生活历史根源》,载《哲学动态》2009年第6期,第6页。该文是哈贝马斯教授于2004年11月11日荣膺日本“京都奖”的答谢词,原载《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Zwischen Naturalismus und Religion*, Frankfurt am Main, 2005, 第15—26页)。

解自己的学术兴趣所在，他一语道破了贯穿毕生的追求。

因此，哈贝马斯的公共性思想应该为我们关注和反思，我们的公共哲学构建可以从他这里找到诸多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总体来看，西方国家学者和我国学者都对哈贝马斯的思想进行了较多的学术探讨，这些探讨尤其是国内学者的努力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梳理是十分必要的。

（一）国外研究现状

作为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者，哈贝马斯的思想是多维度的，其中，批判理论、行为理论、系统理论、生活世界理论、普通语用学、现代性等都可以找到一席之地，迄今为止，国内外对他的思想的研究可以说汗牛充栋。但是，仅就“哈贝马斯的公共性思想研究”这个选题而言，研究成果还是有限的，并且主要集中在对哈氏“公共领域”理论的研究上。20世纪80年代末，亦即在德文版面世约30年之后，英语世界开始注意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9年率先出版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英译本。1989年9月，英国举行了“哈贝马斯与公共领域”主题研讨会，引发了英美等国的研究热潮，“公共领域”（德语 *Offentlichkeit*，英语 *public sphere*）一词不经意间成了英语世界的一个主流政治话语，甚至可以说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析工具或范式。1991年英语世界出版了论文集《哈贝马斯与公共空间》^①，充分体现了英语世界的学者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这个概念的强烈兴趣。

此后，英语世界涌现了一批哈贝马斯研究著作，如美国学者奥斯维特的

^① 即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MIT. Press, 1991.

《哈贝马斯》、英国学者安德鲁·埃德加的《哈贝马斯：关键概念》、美国学者麦卡锡的《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和法国学者洛克莫尔的《历史唯物主义：哈贝马斯的重建》等。这些著作中有的带有传记色彩的思想评述性著作，有的注重将哈贝马斯的思想放到整个西方思想史的大背景中去研究，有的从哈贝马斯常用的关键概念入手，分析他的思想的阶段性和前后连续性，以勾勒他整个的思想框架。总体而言，英语世界大多数成果主要集中于进一步澄清“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对“公共领域”理论的高度肯定以及公共领域和社会的某种要素的关联上，如托马斯·麦卡锡（Thomas Mccarthy）、希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等从哲学角度研究公共领域的概念辨析与演进、公共领域与民主、公共领域与道德等问题，尤其是公共领域与传播媒介的关系受到高度重视。

除欧美学界之外，日本学界对公共领域的研究也值得关注。如前所述，在日本兴起的公共哲学受到欧美思潮的影响，但突破了欧美中心主义的偏颇和局限，是一种具有创造新理论的学术运动，同时强调公共哲学不仅是理论探讨，更要积极行动，把它发展成了政府公务人士的必修功课，因而也是一种在现实中影响到社会进程的运动。日本公共哲学比较突出的代表有：佐佐木毅、金泰昌、山胁直司、源了圆、黑住真、沟口雄三、奈良毅等，他们在问题意识上与欧美“公共哲学”所思考的方向不全然相同，也反对天皇系统下自上而下的“奉公灭私”传统，提出了“活私开公”、“公私共媒”等独特术语。日本、韩国学者的研究带有浓厚的东方文化基调，是基于东方社会的文化传统的，如佐佐木毅（日）、金泰昌（韩）等主编的“公共哲学”丛书第4卷《欧美的公与私》，基于东方的“公私”观念去解读哈贝马斯的公共性思想。

（二）国内研究现状

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就已经有学者研究哈贝马斯，比如198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薛华所著的《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该著作从德国哲学的发展脉络中去研究哈贝马斯，重在阐述哈贝马斯的思想来源，指出他在主体间性结构、道德意识观念等方面都深受黑格尔的思想的影响。